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三百年“中兴”梦

— 唐宋儒学复古运动

朱刚

203

-51

沈阳出版社

三百年“中兴”梦

——唐宋儒学复古运动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绪言

——存亡续统说“中兴” (1)

一、人世几回伤往事

——对开天盛世的追忆与反思 (7)

二、异儒崛起

——啖赵《春秋》学与二王八司马 (17)

三、匹夫而为百世师

——韩愈及其《原道》 (40)

四、颓废与党争

——“中兴”之梦的破产 (66)

五、天留一脉在庐山

——乱世读书声 (75)

六、斯文有传，学者有师

——欧阳修及其门下 (83)

七、文化“中兴”

——复古运动的全面成功 (96)

八、以史为鉴

——复古运动的启示 (104)

绪 言

——存亡续统说“中兴”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当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历代的文物时，我们能够比啧啧叹赏的外国游客更多一些什么样的感受？那按着时间顺序陈列的路线，倘依它固有的方式延长，必会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心中。祖先们通过商周彝器、两汉石刻，通过唐三彩、宋瓷和文人画，一步步向我们走来，除了叹赏以外，还给予我们亲切的感受。每一处凹凸、每一笔勾画，都凝结着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而这欢乐和悲哀与我们的感受切切相关，始终遵循着同样的方式生成。就象心理深层中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籍着这河床而奔涌成一条大江，不致漫无边际而浮浅地四处流荡。这样的河床，便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底蕴，古人叫做“道”。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道”，而不同

的遭际，使这“道”有“明”有不“明”。“明”者，自觉也。首先揭示“道”之精神内涵的人，便是这个民族的导师，炎黄子孙把自己的导师叫做“圣人”，便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时代的发展使知识不断地更新和丰富，后代演变所至，有先贤未尝见诸梦寐者，但本其精神之基调而言，则孔子被称为万世之师，固有其当然之理。

皮锡瑞《经学通论·序》：

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配享从祀，……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

按皮氏此言，盖为时人菲薄孔子而发，自有其深意存焉，但其立言则颇疏率，未尝一检史册。《新唐书·儒学传序》：

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

检《旧唐书·儒学传》及《唐会要》，俱作“贞观二年”，因房玄龄等人建议而有斯举，可为信史。考尊周公为先圣事在武德二年（见《旧唐书·高祖纪》），故皮氏所谓“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后来高宗永徽年间虽曾一度褒周黜孔，复武德旧制，但马上便于显庆二年由长孔无忌等大臣奏议更正，此后便不再变动（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褒崇先圣”门）。故纵观中国历史，自汉至清，尊崇孔子的礼文未尝少衰，所谓“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不为过言。

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迷信，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信念，对本文化的精神导师的礼敬。每个民族都礼敬自己的文化奠基人，或托之神话，或备之宗教，而在中国，则体现为一种学问，叫做“经学”，即研治孔子删订过的典籍。而阐发其思想，揭明其蕴含着的文化精神，为我们立身行事的

旨归，则叫做“道学”。

“道”有“明”有不“明”。孔子当衰周之末，文化凋丧，礼崩乐坏之际，汲汲奔走，“惶惶如丧家之犬”，而自励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开门授徒，创立儒学；他哀叹着经籍的泯散，世之祸乱不止，“文献不足徵也”，故孜孜搜求，“述而不作”，删订六经；他本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揭明中国文化之“道”，以此“海人不倦”；他又忧虑着是非无公论，后世不知所法，便笔削《春秋》，于史事中讲明褒贬的原则，垂之后人；他的言行被弟子们录成《论语》，以师门问答教导所有的人们……因了孔子，中国人对自己本文化的精神有了清楚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使儒家文化成为后代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成为当我们想到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首先浮上脑海的东西，中国文化之“道”于是“大明”。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好几个辉煌一时的文化，如我们常说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文化，都已烟消云散，无有孑遗，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考古学家那里听到关于它们曾经灿烂的描述，而唯有中国文化，则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发展壮大，前途无量。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幸运，不，那些关于地理环境的封闭等等之类解释不足为训，在无数次面临灭顶之灾的关头，那种令神州不致陆沉的力量，根本地来自我们对本文化之“道”的自觉，来自履道者、殉道者的执著和无畏，“造次必于斯，颠沛必于斯”，——根本地来自孔子的教诲。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权德舆《唐陆宣公翰苑集序》云：

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

也。仲民有才而无位，其道不行；贾生有时而无命，

终于一恸……道虽在我，弘之在人。

按权氏感于陆贽事业不终成，悲怆慷慨而发为此论，借圣人“弘道”之言，以为定国安邦之学在我，而得施展与否，则看才、位、时、命之遇如何，将谓弘我之道者，其柄在于人主，人主能使道弘大，而道不能使我获取权位以左右时势——这是他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自有其深刻之处，洞明历史的穿透力，可备一说。但与孔子的原意有所未合，孔子的两个“人”字当同一所指，而权氏则异为“人”（指人主，即帝王）与“我”，将“道”的命脉付与了人主。今按朱熹《论语集注》释此句：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此释除“道体无为”一语略有不安外，基本正确。道之传承不绝，发扬光大，在于人对道的自觉，身体而力行之，才能令其命脉生动。这句话同时也寓托着孔子的深沉感慨，那弘道的人似乎注定要象他那样，颠沛流离，号呼痛极，而不能安富尊荣，坐享清福而无所建树。弘道者必然要承受痛苦，从最高处指导着这个民族之精神的人，还要从最深处担荷这个民族的苦难，“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也许是最深刻地理解着孔子的第一人。

是的，中国文化的岿然独存，固然是我们的骄傲，而回顾这个文化，走过的却是怎样坎坷的历史！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民族文化之道也经历了一次次的晦明交替，当

晦而复明之际，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令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物被献上祭坛，在孔子之后，可以排列出长长一行闪亮的名字，一行痛苦的生命：孟子、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郑玄、王通、杜甫、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颢、程颐、张载、陆游、朱熹、陈亮、文天祥、元好问、方孝儒、钱谦益、顾炎武、黄道周、吕留良、康有为……他们或怀才不遇，或身受极刑，或举世笑其迂阔，或一生辛苦干戈，或遭放逐，九死蛮荒，或值亡国，痛哭无地；而或遍谒诸侯，或发愤著书，或绶帙授经，或河汾传业，或临危受命，力行改革，或慷慨赴难，舍身成仁，或笑傲江湖，临大节则不可夺，或奔走朝野，却视富贵如浮云，“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与其它古代文明一般，中国文化也面临过毁灭的灾难，天地未尝特别优待这礼义之邦，历史未尝少考验这个坚强的民族。继春秋战国之乱，而有秦皇一炬，典籍沦于泯灭，汉初国势给予贾谊的只是痛哭流涕；继三国鼎立，而有五胡乱华，汉族政权偏安江左，佛道流行，玄风大盛，中国不绝如线；继安史叛乱后，而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河朔之民，且不知孔子为何人；继五代十国后，而北宋长受辽、夏威胁，其初年时科举考场上，竟有举子问尧舜哪代人；继南宋播迁后，而有蒙元入主中华，儒生成为“老九”；继东林之祸后，而有建州女真的统治，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继鸦片战争后，而有列强欺凌，日寇入侵，关河江汉之民陷为亡国之奴……每一次灾难，都将毫不留情地毁灭这个文化，其千钧悬于一发之势，都将使神州陆沉，生民无噍类。但中国文化终于不似

其它古文化一般长埋地下，中华民族也终于不似犹太人一样被“永恒地流放”，而在这块禹贡九州之地上孳育不息，于一次次的灾难后重新奋起，将圣人之道再度弘扬。“人能弘道”，便是这弘道的自觉性，唤起着存亡续统的责任感，使文化再度“中兴”。无论是贾生的痛哭流涕，还是江左的谈笑风生，无论是唐宋复古运动，还是明清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口号，都体现着这样强烈的使命感。而在历史的浮雕上凸现出来的那一个个人物生动的形象，都堪称宇宙之精华，人类之英杰。

本书选取一段民族文化衰而复兴的历史，即传统人文精神之“道”由晦灭而复振起，蓬勃为一次文化“中兴”的历程，即从中唐到北宋的儒学复古运动，加以概述和论赞，本之史实以见盛衰功过，依所学而清理各种学说的源流正变，大旨在揭示那三百年间文化中兴所涵泳着的民族精神，即“道”的体用，以为今日弘扬民族文化之借鉴。

一、人世几回伤往事

——对开天盛世的追忆与反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相传唐穆宗长庆年间，诗人刘禹锡有一天与元稹等人相会于白居易家里，共谈南朝旧事，引起怀古的感慨，相约各赋一诗，以南朝的京都金陵的兴衰为题。当下刘禹锡斟满一杯酒，一口饮下，即诵出诗句，内有“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之句。白居易大为赞叹，说我等一道探骊龙，而你先得珠，我等都得搁笔了。^①

关于唐诗的这类传说小故事甚多，大都脍炙人口，虽考之史实，渺有真迹，而颇堪助讽诵，启深思。按长庆间刘禹锡远谪南方，必不能在京师与元、白唱和，是知故事并非实

^① 刘诗见《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题《西塞山怀古》。事载《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刘禹锡”条下，又见《全唐诗话》卷三。

录；但我们仍有确凿的证据，考知白居易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推崇^①，而此故事中，借白居易之口称刘诗“探骊得珠”，亦决非过誉。

刘诗的妙处，在于它借着对某一特定古迹的感怀，而写出了人类对于“过去”的难以言说的伤感，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伤感。“人世几回伤往事”，不是吗？过去总是有着被追忆、被回味的吸引力，漫长的时间里充斥着的大量琐碎的细节被轻轻略去，历史浓缩成一幕短短的戏剧，那骤然起伏的大喜大悲与现实生活的缓慢的节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也拉开了距离，于是，出现在笔下的过去总带上梦的色彩。

一般的过去尚且如此，而那种由极度的繁盛和欢乐跌入衰败和悲哀的人们，又会怎样地思念过去呢？《红楼梦》写贾宝玉“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惜的是作者只写完了前半部，而所有的续作者都不能体会曹雪芹的原意，没有一个认真去刻画“贫穷难耐凄凉”的境况！这“凄凉”里该含有无穷无尽的对于过去曾处“温柔富贵乡、锦绣繁华地”的追忆，这追忆使当前的凄凉倍增凄凉，不堪忍受，如何能“耐”！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灿烂的盛世，那也是中国人在地球上最为骄傲的日子，至今人们犹啧啧称道的“盛唐气象”，便是它的产物，那便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四十年强盛和繁华，史称“开天盛世”。这一盛世与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由刀光剑影和阴谋政变开始，在新的统治集团清算了武则天的政治影响以后，唐太宗的清明的理性所建立的秩序

^① 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

感，与武则天以无比严酷的方式摧残传统士族门阀势力所唤起的一般中下层士子的参政欲，马上在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推动整个社会大踏步地走向昌盛。升平、富足、开朗、上进、充满希望，激发着一切人的创造力，不可思议的狂傲，令人咋舌的大言不惭，永不满足的勃勃雄心，在那个时代却是稀松平常。领一旅之师，深入虎穴，扫平敌国，建万世奇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理国政，澄清六合，做玉堂春梦；以天下最美的女子为情人，以天下所有的朋友为兄弟，以天下名山大川为浪游无所不至之地，而天下所有财富皆我伸手可取之物——这便是盛唐人理想的生活，阿Q梦里的白盔白甲、未庄人的奉承、大脚的吴妈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在盛唐人看来，不啻如同草芥。

意气风发，人才辈出，四海之大犹如一座七宝楼台，人人都企望成为它顶最耀眼的明珠，几乎谁都不及去想它会突然崩溃。在灾难来临之前，尽管也有个别人为了某种不祥的预感而忧心忡忡（如杜甫），但整个社会依然沉醉于盛唐式的生活理想的追逐，而不予理会那微弱的声音。即使那些多少有些预感的人，又何尝真正思虑、设想过盛世崩溃以后的日子？又何尝不在灾难骤临时显得惊慌失措，如众人一般毫无准备？是的，当贾府全盛的日子里，秦可卿的魂灵对王熙凤的提醒，岂能阻止她走向宿命的脚步？

极乐生悲，极盛而衰，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式的辩证智慧每一次都只在事后才显出深刻的力量。“盛唐气象”养育着“安史之乱”的祸胎，武装强大的边疆“胡人”，曾经是为“盛世”开疆拓土的巨大军事力量，却也会是反过来摧毁“盛世”的狂风暴雨。最清醒的杜甫，也要到事后才写道“羯胡

事主终无赖”，^① 而此时的朝廷，却不得不利用另一批“羯胡”去对付已经造反的“羯胡”，而每一次利用都明白地显示出自身的羸弱，都给下一次变乱的主谋提供可乘之机。外患不止之际，当局对外患的束手无策又必然招致朝野的不满，酿成内乱，以为这个皇朝送葬。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导演如此循环的悲剧，汉武帝时代那样善于作战的中国人，他们的子孙似乎都只会玩弄“借刀杀人”的把戏，“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② 而回鹘终成唐后期的大患，女真也终于逼得宋朝南渡，借来杀人的刀结果总是伤了自己。难怪近代以来，章太炎、黄侃等人要一再地极呼“尚武”、“尚勇”、“尚侠”，以此为拯救民族的药石。^③ 然而那又何曾阻止中华民国的总统把抵御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又何曾阻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博士把振兴的国策建立在“全盘西化”上？

然而唐人毕竟是唐人，他们昂扬的意气在一阵目瞪口呆之后还不曾丧失殆尽，大梦初醒的他们，因为要夺回往日的美好，恁地又暴发出一声大吼：“中兴！”

就是因了这不能实现的“中兴”之梦，中国文化史在唐北宋之间来了个极大的转变。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云：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

① 杜甫《咏怀古迹五道》之一。

② 《陈寅恪诗集·丁亥除夕作》。

③ 参章太炎《检书》重订本《儒侠》、《经武》诸篇，及附录《上武论徵张良事》等。

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叶燮《已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

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

依此，将“安史之乱”后三百年间历史演变概括如下：因了“中兴”之梦而引起关于“中兴”国策的议论，形成广泛的思潮，由于韩愈等人的努力，而使此思潮的主流成为“儒学复古运动”。以儒学复兴求政治“中兴”，因李德裕的失势而成为泡影，但儒学复兴唤回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却因“道学”的兴起而延续、发展至北宋，因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出现，而规范政治、教育士民、养成风气，使北宋仁宗时期展现出一个历史上最接近于圣人理想的社会，成为儒家文化亦即传统中国主流文化的一次“中兴”。一句话，政治“中兴”之梦引发出“道学”，而“道”的揭明训致文化“中兴”。此书名“三百年中兴梦”，即此意也。而自首至尾，是一个儒学复古运动。

按照孔子的垂训，《诗经》有着“兴观群怨”的作用，而作为诗中之经，那不言而喻地是诗歌的最高典范，凡认真作诗的人，必要以“拟配”《诗经》为一生追求的艺术巅峰，所以中国的诗歌总是最及时地喊出一个时代人的心声。“开天盛世”刚刚过去，如梦的追忆便在诗歌中出现了，第一个便是诗圣杜甫。他目睹过盛世，分享过那个时代的壮志豪情，结识过一批飞扬跋扈、痛饮狂歌的朋友，然后经历了动乱，跌入衰败，在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中写下了一系列追怀旧日的作

品，《八哀诗》、《昔游》、《壮游》、《往在》、《忆昔行》，等等，他伟大的诗歌艺术使这些作品具有了永恒的魅力，而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膝。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杜诗本最善于铺陈，“全盛”之况正需要这样铺陈的大手笔，仇兆鳌注此诗云：

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闻开元，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饌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

盛世繁荣，导致了极度的享乐，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玄宗和杨贵妃，他们的霓裳羽衣舞曲，他们的骊山华清池温泉宫，直到安史乱起，李杨仓惶出逃，贵妃葬身的马嵬坡，这些都是诗人们一再咏叹的对象。韦应物有《骊山行》、《温泉行》、《酬李户曹骊山感怀》，皇甫冉、张继都吟过《华清宫》，戎昱笔下出现过《秋望兴庆宫》，李益、李商隐咏过马嵬坡，元稹、白居易也对霓裳羽衣舞显得一往情深……往日的盛世在诗人们的笔下向两个“意义指向”发展，一是追寻祸源，一是那种永远地失去了的，不可企及的美。

“空廊屋漏画僧尽，梁上犹书天宝年。”^① 一场动乱之后，人们只能在一堆废墟之中，在破败的庙宇和残存的壁画间，一次次发现往日的题记，追想这里曾有无数的身怀绝艺的画僧，曾有富丽堂皇的满壁彩画。清静法地一样地感受过盛世的气象，这气象我们至今还可以在敦煌盛唐时期的壁画中略窥一斑。那种铺天盖地，几乎不留一丝空白的琳琅满目，而又五光十色，掩映眩人的场面，那飘逸绝尘的风姿，活泼刚健而又圆转流畅的线条，整体的生气贯注，无边圆融的华藏世界庄严海……这一切，都是唯一地属于盛唐的艺术境界，再也呼唤不回了。

也许音乐最是艺术的精华，“此曲只应天上有”，对音乐艺术富有高度感悟力的唐人，大都以“如听仙乐耳暂明”为最高的精神享乐。在所有追忆盛世的唐诗中，铺叙繁华自以杜甫《忆昔》为巨擘，抉发幽思莫过于李商隐的《马嵬》，而以清丽流畅的语句形容那导致过悲剧的极乐场景，再现那如梦如痴的往事，则要推元稹的《连昌宫词》为首。这位长庆间为宫中盛传诗句的“元才子”，其笔下的欢乐，便不是盛饌美饰的繁奢雕琢，而是一连串有关音乐的近乎神话的传说：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官树绿。夜半高楼
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
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
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
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
兹》轰续续。李谟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平

① 《全唐诗》卷三〇一王建《废寺》。